

12.12

革命春秋

中共含山县委党史办公室

一九九〇年十月

序

金隆芳（陈默君）烈士是位平凡中的不平凡人。抗日战争中我同他在华北太行区工作中相识。从平时工作接触中我感到他是位谦虚严谨、平易近人、热爱祖国、酷爱革命工作的好同志。他尊重领导、尊重同志、实事求是，非常耐心地处理日常工作；他处事对人非常诚恳、谦逊，从不以领导者自居，使工作在他周围的同志感到温暖、愉快；他在成绩面前从不夸功自满；他在困难的局面中，从不把困难推给别人。这些正是他不平凡之处。

金隆芳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，他有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，简朴廉洁的革命精神，他组织观念强，能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掌握大的原则，不失去既定的方向。

金隆芳同志是在1942年5月太行区反“扫荡”中壮烈牺牲的，他为反侵略卫中华流尽最后一滴血、正因为中华民族有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为国捐躯，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胜；也正因为有象金隆芳烈士这样模范的共产党员，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、不屈不挠的奋斗，才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。我们一定要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，继承烈士遗志，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昌盛、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努力奋斗！

傅大章

一九九〇年三月



金子美遺照（1934年在上海）



一九四〇年二月，朱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——山西武乡王家峪村，召集军队和地方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。照片正中是朱德总司令，右边是徐悲庸，左边是陈铁耕，手扶圈椅是李伯钊。左上角后排穿黑军装是陈默吾。

陳君烈士殉國四十八周年紀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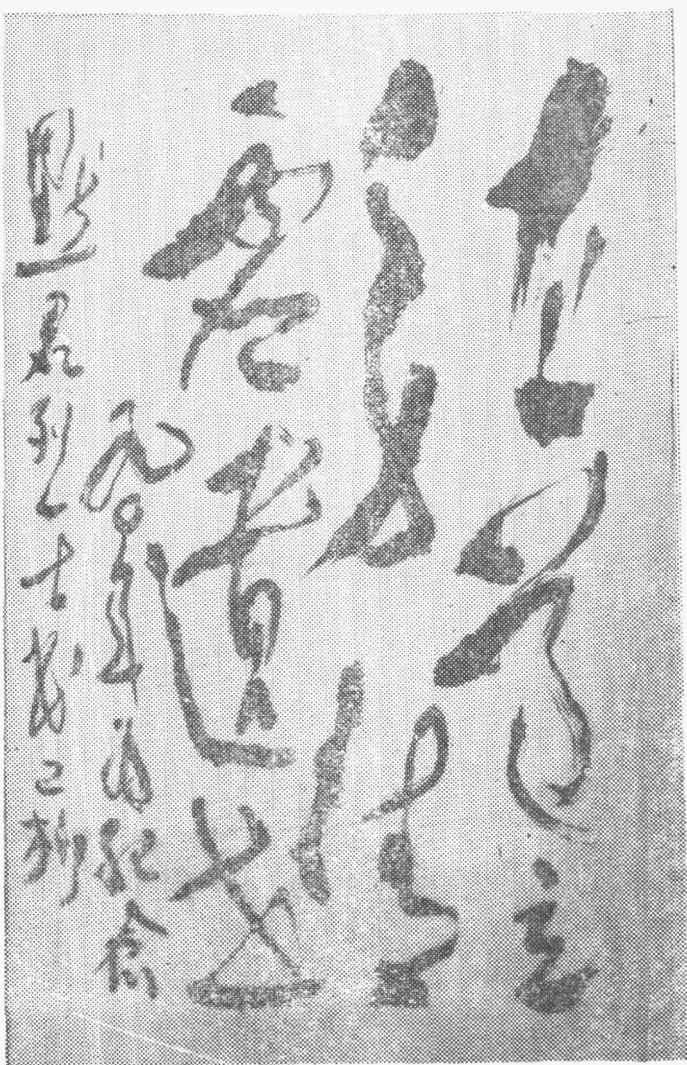
為國捐軀名垂千古

戎子如
二九九年三月

七七九
存月照魂
何時雙目
在耳一候
教教聲
引教道平
海教可
新呼日
終念心
平情風
絕然君

此詩乃七七九先生所作，其意深長，不可不察。七七九先生，名七七九，字七七九，號七七九。其詩多言人生哲理，此詩亦然。七七九先生，生於七七九，卒於七七九。其詩多言人生哲理，此詩亦然。七七九先生，生於七七九，卒於七七九。其詩多言人生哲理，此詩亦然。

七七九先生
七七九先生



金子美烈士传略

陈默君，原名金隆芳，号子美，别名斯理。1912年出生于安徽省含山县褒山乡大庙村，1942年5月在反击日军大“扫荡”中于辽县（今山西省左权县）麻田壮烈殉国，时年仅三十岁。

（一）

金隆芳祖籍原在安庆市怀宁县石牌镇附近，后被逼迁含山县褒山定居。金隆芳幼年时代，家庭由贫困逐渐走上富裕，本地地痞豪绅串通上门找岔，硬说金家买的荒山是他们的牧场，原订的契约无效，如不将家迁走让出山场，就得向他们年年交租。为这件事双方打了一场官司。由于金家得到一位有文化亲戚的帮助，打赢了这场官司，自此在褒山站住了脚跟。这件事对刚刚懂事的金隆芳触动很大，使他从小就认识到社会的不公，读书的重要。

金隆芳兄弟姐妹七个，他排行老二，孩童时就能熟背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，深得父母的宠爱。

1926年秋，金隆芳进含山县立高等小学读书。由于他聪颖过人，性情温和，从不与人争吵，各科成绩都列优等，乐于帮助别人，自然而然地同学们都愿意接近他，无形中他就成为孩子中的“头头”，被推选为级长。

小学读书的时光中，他在学校还有个很美的绰号：“金大牌坊”。因为他的个条在同学中略高，排起队来他是排

头，再加上他的学业和品德的优良，大家叫他“金大牌坊”，这既是敬佩，也是向他看齐的意思。

当时，学校有一位英文先生，名叫张立诚，是刚从芜湖赭山中学来的，既不懂教学方法，又经常缺课，作业更是不改，如此不负责任，自当遭同学们的非议。

一天，上课铃响了，不见先生到堂，课堂上乱哄哄一片。几十分钟过去了，张先生挟着书本，拿着教鞭，蹒跚而来。他一步跨进教室，乱哄哄的教室陡然鸦雀无声，学生们怒目相视，班长金隆芳气愤的连“起立”也没有喊。这一下，惹恼了张先生，他大声训斥同学们没礼貌。

金隆芳在同学们齐刷刷的目光下不慌不忙地站起来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误了我们的课程，浪费了我们的宝贵光阴，不配做我们的先生，自不知过，如何能使我们尊重呢？同学们，我们和他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。”

全班同学在金隆芳的带领下纷纷走出教室围着张先生跟他说理。张故作镇定，色厉内荏地挥舞着教鞭，一边敲打同学们的脑袋恫吓，一边嚷嚷道：“你们反了天乍的，师之为父，你们这些忤逆之子，不孝之徒！”同学们一时被唬住了，乞求地看着他们心目中的“金大牌坊”。

“不要听他那一套，我们到校长那里去评理，这样误人子弟，不负责任的师长我们不要，走呀，找校长去！”同学们听金隆芳这样一鼓动，勇气又来了，离开张先生，就去找校长。

此时校长蒋大为闻讯赶来，张先生自愧的溜走了，从此再也不来授课。这件事，使金隆芳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更高了，他成了全校学生的中心人物。

当时，金隆芳的家已从乡下搬到县城东边，那里环境相当幽静。其时有位在含山的桐城人闻先生，常到他家作客，并于晚间教金隆芳兄弟们的古文。闻先生教他们学《左传》，那深奥的道理，古怪的句式，对刚刚上小学的金家兄弟们其枯燥、拗口可想而知，但不学不行，严厉的父亲对孩子们的学习过于苛刻，每篇文章先生教后，都要背诵，背不出来，一顿皮肉之苦不说，还要进行没完没了的训斥。兄弟们的苦恼，隆芳暗暗记在心中。有次闻先生教他们学韩愈的《获麟解》，大家都模模糊糊不太懂，隆芳站起来先对先生鞠了个躬，说不理解此文的道理，有板有眼，一本正经的样儿逗得一向严肃的闻先生开怀大笑，并赞道：“这孩子，将来必有出息。”恰巧先生旁边有《水浒传》一本，隆芳指着《水浒传》对先生说：“我们读不懂那些古文，请先生给我们讲讲这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吧！”

闻先生甚觉诧异，原来隆芳在闻先生不注意时偷看了他放在旁边作枕头的《水浒传》，故出此语。闻先生抚摸隆芳的头，极喜爱之。后来，闻先生一改教学方法，从易到难，由浅入深，偶而还教白话文，并且指导他阅读《三国演义》《史记》等。在闻先生的教诲下，金隆芳更加刻苦发愤，其进步之快，常常使闻先生竖姆指称赞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28年秋季，金隆芳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于含山县立高等小学。

现实中的不平和书本知识的启迪，使少年时代的金隆芳过早地成熟起来，一种追求光明、追求真理、追求知识的渴望，深深地刺激着他。

(二)

1929年，金隆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安徽省立第一中学（安庆一中的前身）。安庆是著名的古城，有“宜城”之称。自清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建立安徽省制，直至1937年抗战为止，近300年间，一直为安徽省府。这里不但战略地位重要，向来还是人文荟萃之地，清代末年，即兴办了全省最早的大、中学堂。1892年设立求是学堂，严复任该校监督，苏曼殊任过教师；1912年秋，陈独秀就该校校舍筹办安徽省立大学，1927年正式建立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金隆芳面前展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他就象鱼儿入海，鸟儿游天似的孜孜不倦地在知识的宝库中探索。

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，安庆是义旗迭举，先驱辈出的地方。1907年，与浙江秋瑾同举义旗的徐锡麟，1908年熊成基率马炮营起义，皆为当时震惊中外的民主革命先声。

“五四”运动后，这里又爆发了著名的“六二学潮”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刚刚步入青年行列的金隆芳一方面刻苦学习，一方面开始接触社会，特别是对进步书刊有着广泛的兴趣。

1930年，在蒋介石加紧对根据地进行“围剿”时，金隆芳毅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为了配合大别山区红军反“围剿”的斗争，他积极在校内、校外、城区、郊区发动工农支援红军。

1931年，为了斗争的需要，党派金隆芳去上海中国公学读书，用号名金子美，从事党的地下活动。这个学校历史悠久，为社会名流创办，治学上素有民主风气，学术研究、思想领域比较活跃，是我党在上海一个有力阵地。金子美在

这里一面刻苦求学，一面积极投入党领导的学潮中去，很快就成为一位很有组织才能的学生领导者。

1933年秋，金子美进入了上海江南学院读书。逐渐成熟的他，不但能深入群众、团结群众、组织群众，而且能在严酷的斗争中，以群众的身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。当时，国民党CC干将丁默邨是江南学院的教务长，把持了学院的实权，其办学宗旨是收罗党羽，实行控制，为CC培养人才。鉴于上述情况，在党的决策下，由金子美领导的，以反对国民党CC干将丁默邨为契机的学潮轰轰烈烈在江南学院开始了。这次学潮打击了上海“二陈”（陈果夫、陈立夫）的势力，不久江南学院倒闭了。

1934年春，金子美转入上海中国公学。当时国民党也积极地向中国公学渗入，将校长熊克武排挤出校，换了国民党骨干分子当校长。为争夺这阵地，金子美经过多方调查，制订详细方案，利用同学们的普遍情绪，以校长不学无术，大造舆论，组织发动了反对校长的风潮，并率领部分学生到校董事长蔡元培先生处请愿，要求校长与学生对话，迫使校长认错隐退，达到了预期目的。

1934年夏，金子美利用假期回家乡组织了“含山县旅外学生同学会”，其宗旨是联系感情，研究学问，提倡科学和民主，反对愚昧和盲从，会员三十多人。

从大学出来的金子美更加广泛地深入到社会中去。他被聘到上海杜美路惠平中学任教，并以此职业为掩护做革命工作。在教学中，他一改陈规陋习，以新颖的教学方式，深刻的讲解和分析，博得学生们好评。他非“科班”出身，但他为了上好每一节课，总是认真备课，将教学计划工工整整地

写在备课笔记上。在教材选择上，他不局限现有的课本，将一些思想进步的文章有步骤地介绍给学生们，特别是对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大加推崇，并就鲁迅、矛盾等作品入手，进而介绍唯物史观和马列主义，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。

在一面教书，一面做革命工作的同时，金子美还积极参加进步文化革命活动。1934年秋他加入了党直接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团体“社联”（全称为“社会科学家联盟”）。这个组织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成立，其宗旨是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促进中国革命，当时由胡乔木和王翰领导。与金子美一起在“社联”过组织生活的有湖北人陈家康、黄美坚、周南交等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，而且主观世界也有了一个大的飞跃。听艾思奇的报告，学习恩格斯的《自然辩证法》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，出版多种刊物，组织读书会 and 科学研究小组，并在工人、学生中开展业余的文化教育活动，还如饥似渴地阅读理论书籍，这些大大地拓宽了他的眼界，为他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者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1935年，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向华北，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夺取华北统治权的严重事件。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，压制人民抗日活动。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表了《八一宣言》，使党关于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的主张迅速在群众中传播。同时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，也传入国民党统治区，在进步人士和青年中激起抗日救国的新希望。1935年12月9日，北平学生5千人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，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镇压。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，得到各地学生的热烈响

应。这个时期的金子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去，他和在上海读书的同乡张克林组织了声援平津学生的游行罢课运动，并且还组织部分学生到南京请愿。这一系列的爱国行动，对他来说受益非浅：首先，他更进一步地接触社会，了解了社会；其次，这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，使他更加充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。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后，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，更广泛地团结群众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上海文化界根据中共党组织意见解散“社联”等左翼文化团体，并以这些团体之中的党员、盟员以及影响下的群众为基础，推动上海各界救国会组织的成立。年底，上海先后成立了“国难教育社”、“文化界救国会”、“职业界救国会”等。当时“国难教育社”负责人之一郑伯克（现任中央组织部顾问），介绍金子美参加了他领导的“国难教育社”。由于金子美是骨干，在救亡工作中很努力，成绩显著，受到了陶行知先生在干部大会上的表扬。

1935年，金子美离开了惠平中学，执教于上海华美女中，并参加安徽同乡会。那时，国民党一方面对上海文化界实行镇压，另一方面也派一些爪牙渗入一些社会团体，目的是排除异己，同化组织，为国民党服务。在同安徽同乡会CC分子樊振邦之流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中，金子美的智慧与胆略得到充分的体现。

当时安徽同乡会中的CC分子樊振邦一伙人，在上海大肆活动，到处拉帮结派，并以改选理事之名，企图塞进CC分子。为了与国民党CC派争夺这块阵地，金子美对此进行认真的分析与筹划，估计了敌我力量，决定将计就计，打进

理事会，扩大我党在同乡会的力量。他和同乡好友刘正文（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）进行商讨，四处奔走，联络安徽在上海一些大学的同学，争取选票，并对一些思想有顾虑的同乡进行细致的工作。结果新选举的理事会中，金子美、刘正文双双获选，至使CC分子樊振邦恨怒不安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1935年春节，金子美从上海回家，给他最深刻的感受是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腐败，劳苦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贫困、麻木、民族的危亡，强烈地刺激着他，一种唤醒民众的责任感，震撼着他，他奋笔疾书“家住青天白日下，人在伤心惨目中”对句作为春联贴在自家的大门上。大年初一早上，人们争相传闻，一时议论纷纷，在沉睡、麻木、死水般的小县城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1936年初，金子美回沪。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，团结爱国人士，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，党决定由郑伯克负责，具体由金子美和吴莆生（后改名吴新稼，曾任国家体育委员会教育司司长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务长）筹办余日章第三小学。金子美任校长，改名叫金斯理。吴莆生是该校党支部书记，与金子美单线联系。学校中的教员大部分是进步的，有的是共产党员，他们只吃饭不拿薪，白天教小学生，晚上办工人和妇女识字班，那无私的奉献，真诚的为教学服务的精神，深深地感动着身为校长的金子美。他不仅忘我的工作，而且时时为教员的生活着想，教员一旦有困难，他总是竭力给予解决，可他自己却十分节俭。为救济同志，他慷慨解囊，当衣当物，甚至将仅有的买菜钱都给了一位急需钱的同志。由于劳累过多，再加上营养不足，他原先就有点消瘦的脸颊显得更加黑瘦，肺病的魔爪慢慢地攫住了这

位血气方刚、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。

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“卢沟桥事变”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策划的一个严重事变。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，号召全民族抗战。

这时的金子美正在家度暑假，卢沟桥的枪声又使这位青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家乡抗日救亡运动中去。他招集含山旅外同学，动员各界人士组织抗敌后援会，游行集会，贴标语，演话剧，搞募捐，将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如火如荼。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升级，他不久返沪，坚决要求到抗战的最前线去。

1937年秋，党派金子美去革命圣地延安。生气勃勃的延安深深地吸引着他，同时也激励着他。9月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（延安大学的前身），成仿吾任校长。当时，金子美化名陈默君在该校负责招生工作。这是一所为抗日根据地培养干部的学校，吸引着一批批来自国统区的热血青年，招生工作空前繁忙。陈默君就象他名字一样默默无闻，埋头工作，硬是将才创办的陕北公学的第一步——招生工作，进行得有条不紊。

由于陈默君工作踏实、负责，成绩突出，再加上有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组织才能，1938年初，他担任陕北公学四队主任，负责党支部工作。在此期间，他还写信给胞弟金隆森和同学张克林，介绍他们来陕北公学学习，使他们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后来都成为我党的有用人材。

（三）

从抗战爆发初期到太原撤退的前夕，党即有计划地把山

西分划为四块，配备了各种干部去建立敌后的抗日根据地，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，以坚持敌后与适应全国的持久战。这四块根据地就是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，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绥，以中条山和黄河为界的晋西南和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东南。晋东南先称为晋冀豫后又发展为晋冀鲁豫边区，是当时华北最大的一块根据地，以朱德、彭德怀为正、副司令的八路军总部，中共中央北方局，以刘伯承师长、邓小平政委的一二九师师部都曾在这个地区长期驻扎，领导军民抗战，建立不朽的功勋。

1938年下半年，随着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，迫切需要一大批干部深入敌后开展工作。

1938年12月初，党决定派陈默君前往晋冀豫工作，化名陈希愈，并配给“上尉文书陈希愈”徽章和八路军服装，作为一路上掩护之用。不料就在陈默君赴西安路经咸阳时，被国民党宪兵悍然扣留，更不幸的是第一批被扣人员还有一位“少校参谋陈希愈”，两位陈希愈，同名同姓，引起敌人的怀疑。

当时的真实情况是：陈希愈等四人（张越、杨清华、李克坚）离延安时，组织上先给签了一个“上尉文书陈希愈”的徽章，后来考虑到工作方便，又改签了一个“少校参谋陈希愈”，决定由陈希愈带队，准备在“八路军西安办事处”转办手续后赶赴根据地。过了几天，组织上估计陈希愈等已抵西安，便将原先签署的“上尉文书陈希愈”的徽章发给前往根据地的陈默君。

事有巧合，两个陈希愈相继被扣，且又关押在一起，同时关押的还有张越、杨清华、李克坚、贾克诚、武坚